

“我思故我在”，还是我直觉故我在？

——纳桑尼尔·霍桑对现代性自律主体认知论意义上的解构

蒙雪琴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101)

摘要:现代性沿着热内·笛卡尔的“我思”确立的人性观相信人是自因、自明、自律的认知主体。对人的如此信心激励着 19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超验主义运动、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都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但是,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作家的纳桑尼尔·霍桑却有与这种启蒙理性宣扬的人性观不一样的观点,表现出与西方现代文化非理性主义人性观的相似:人的主导力量是他意识深处的无意识力量,人的无意识因素才是他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根本途径。霍桑能在当时新文化正以强烈之势激励人心之时,如现代思想家那样看待人性,表现出了霍桑对人、人的生存境遇洞察的深刻性及前瞻性,以及霍桑对真正关怀真实人性的人文主义的探求。

关键词:纳桑尼尔·霍桑;现代性人性观;自律主体;非理性主义;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4-0136-07

收稿日期:2019-10-17

作者简介:蒙雪琴(1958—),女,四川西昌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欧美文化、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人如何认知世界、认识自我?这是各时代都在努力探询的问题。在传统的宗教社会中,人们相信人通过神意在自我、看世界。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以人的自我确立为目标的,是对人本性是理性的统一体的确认,认为人的理性使人能自因、自明、自立于世界,相信通过理性的发挥人能够认识世界,是对热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①的进一步发展。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认为,启蒙话语表明人的身份建构“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②。

发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的超验主义运动是美国的第一次著名思想文化运动,也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高潮时期。虽然该运动的兴起是对启蒙运动过于强调理性的反叛而崇尚直觉等非理性因素,但启蒙人性观是促成其发生的主要因素。对启蒙人性观的确认与发展,给该运动带来了巨大动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对自己有了强大的信心,认为人“自助”(Self-reliant)时就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人因此天生具有强大力量^③。该

^①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Trans. Donald A. Cress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6), 65.“我思故我在”话语最早以法语“je pense, donc je suis”出现在笛卡尔 1837 年发表的《方法论》之中,所以能够很快在大众之中传开。参见:William E. Burns,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01), 84.

^②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 Stuart Hall, et 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275.

^③Tiffany K. Wayne ed., *Encyclopedia of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6), 36;拉尔夫·爱默生《超灵》,载《爱默生散文选》,蒲隆译,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5—123 页。

运动因此特别强调个人的崇高与重要，而隆重地歌颂人，从而使个人主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①。其代表人物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认为，人具有上帝那样的博爱和理智的禀赋^②。他的散文名篇《自助》对此作了形象阐释：“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在你个人心灵中对你来说真实的，即对所有人都是真实的。……解放自我，展现出你自己真实的自我，你将一定会获得全世界的认同”^③。

但当时另一重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对如上超验主义启蒙认识观却有着不一样的观点。他给爱默生的画像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把他的手伸入云中，徒劳地探寻真实事物”^④。乐莱德·帕森(Leland S. Person)指出，在霍桑看来，“超验主义思想太虚幻、太乐观”^⑤；菲利普·麦克法兰(Philip McFarland)认为，霍桑的著名长篇《福谷》就是直接针对当时超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写的，其人物、故事情节都是在讽刺、质疑超验主义这样的人性观^⑥。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F.O.马西森指出，是“美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对像霍桑这样个人的影响让他对爱默生(提倡的)独处的新自由感到不满”^⑦。著名学者迈克尔·J·克拉库里西奥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见证人的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纳桑尼尔·霍桑就明确地拥有不同的意见。”^⑧分析霍桑的一系列审美塑造及一些自传性话语，我们也认为其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对人的认识观与如上启蒙认识观不一样的洞察。因为从霍桑作品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看，从他们的心理本质、命运遭际看，我们可见作者有意识地在对比着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探讨着人的认识途径问题、人的本质问题。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见两类人：第一类人深受启蒙人性观的影响而以认识的主体自居，自认为能够认识世界、把握自己的命运，其遭遇却是认识不到真实的自我与世界而惨遭悲剧命运；第二类人是那些富于通过感性因素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人，却常常会对真理有所感悟。而这其中尤其触动读者的是那些由于理性认识观的误导而遭遇悲痛的人，在悲剧导致的痛苦、恐惧、焦虑之中却因非理性因素的激发而对人、人类的生存有了些许的真实领悟。如此的呈现使我们看到作家对现代性所宣称的人的自律、自明、自因的理性统一体的质疑与批判，而揭示出 19 世纪末以来以弗洛伊德理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现代精神分析学那样对人的理解：真正对人产生主导力量的是他意识深处的无意识力量——本能、直觉等非理性的因素。非理性因素才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根本性途径。

过去的霍桑批评中总有或认为霍桑面对现代文化而保守迷茫^⑨，或认为他是启蒙理性新文化支持者的观点^⑩。我们如此的视角是对过去这些批评的质疑与颠覆，揭示出了霍桑的锐利与前瞻性，因为对人性的无意识

① Ellen Meiksins Wood, *Mind and Politics: An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Liberal and Socialist Individualis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6.

②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Divinity School Address,”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d. Nina Bay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527—539.

③ Ralph Waldo Emerson, “Self-Reliance,” in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1, ed. Paul Lauter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1542—1544.

④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American Notebooks,” in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V8, ed. William Charvat et a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36.

⑤ Leland S. Perso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thaniel Hawt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

⑥ Philip McFarland, *Hawthorne in Concord*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149.

⑦ F. 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260.

⑧ Michial J. Colacurcio, “Ide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1, ed. Emory Ell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8.

⑨ 查尔斯·斯旺和拉里·J.雷诺兹都有论及，甚至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评论界都还持有霍桑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比较一致的观点。参见：Charles Swann, *Nathaniel Hawthorne: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 Larry J. Reynolds, *A Historical Guide to Nathaniel Hawthor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9.著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萨克万·博科维奇指出，《红字》中海斯特最后回归重新戴上红字 A 具有保守主义意蕴。参见：Sacyan Bercovitch, *The Office of The Scarlet Letter*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17, 87, 89. 对于罗伯特·迈尔德来说，霍桑的保守主义思想就表现在他的怀疑论中。参见：Robert Milder, *Hawthorne's Habitations: A Literary Lif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2.

⑩ 对于霍桑民主思想的评论，我们可在 20 世纪末以来的诸多评论家中看到，如查尔斯·斯旺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霍桑作品虽有浓厚的传统思想，但也通过福谷事业等，以及他的人物如海斯特、赫尔格拉夫等，表现出了他对革命的期盼。见：Charles Swann, *Nathaniel Hawthorne: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2—5. 约翰·阿尔维斯指出，霍桑作品审美地表现了对当时支撑美国民众信心的现代性宣言的信赖，表明他是当时现代性人性新论的支持者。见：John E. Alvis, *Nathaniel Hawthorne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 Revolutionary Principles Domesticated and Personaliz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39.

作出此种自觉的认识,对人的意识、心理能作出如此的洞悉,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作如此的解构而有意识地崇尚人的非理性认识能力,更多的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的风尚,是现代心理学、现代文化对人性的认识与描述,对人非理性因素认知能力的确认。另一方面,霍桑如此呈现启蒙认识观对人及其生存境遇的冲击,也表现出了有如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直至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那样对启蒙人性观的虚妄及把人推入的新的困境的批判^①,以及如何能够真正地观照真实人性的诉求。

一 非理性主义认识观

非理性主义的阐释是:人的所谓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一种自我欺罔的虚设,认为只有依靠直觉,即通过无意识、本能、情感、烦恼、孤寂、绝望等心理意识,才能使人直接体验到自己的存在,达到对真正实在的认识。

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指出,“心拥有理性所缺乏的理性”^②。借此,他强调非理性情感所拥有的理性能力。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认为,人类要认识世界的本质不能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人的许多行动只是意志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追索,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途径:抓东西的意志产生手,吃东西的意志产生肠胃,繁殖后代的意志产生生殖器官,走路的意志产生脚^③。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认为,人不能任由理性为人作选择,非理性因素才是人通往真理之路径,非理性带来的灵感更具有实际效用和真实性^④。

19世纪末以来,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更加强势的发展。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主张用意志、本能和直觉代替理性认识,认为通过理性来认识只能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⑤。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也认为,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对世界有所认识,因为唯有依靠本能的直觉才能经验世界的本质^⑥。如干布里拉·法里拉(Gabriella Farina)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更强调人是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人根本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世界,凭借理性所获得的所谓知识只是一种虚幻。人越是依靠理性与科学,就越会造成自我更深重的“异化”,越是使自己被愚弄、被欺骗^⑦。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开创的现代精神分析学第一次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对无意识作了系统的分析,对人是理性自律主体的启蒙人性观表现出了更大挑战。在弗氏理论中,非理性因素、人的无意识力量成了人生命中真正的掌控力量,引导着人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决定人行为的是人的情欲,即“力比多”(Libido)。“力比多”是指人的无意识的性本能。弗洛伊德把人的整个心理和认知结构比作一座海中冰山,沉没在水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无意识,意识部分只是冒出海面顶端的小部分。他把他对人的这种心理和认知结构划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本我“力比多”是原始本能冲动,是无意识,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自我是指意识和自我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在“力比多”的冲动和外在世界之间协调着;超我代表社会文明和道德,遵循的是“至善原则”,它监督、检查着本我,不让它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行事^⑧。如此,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人要得到完满的建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本我应该得到比较完满的发展,而不是总受文明的压抑而不能遵循自己的欲望。但人必须某种程度地遵循社会与文明原则以使社会能够有序地运转,所以,弗洛伊德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①20世纪以来的许多现当代哲学家,如阿道尔诺、霍克海默、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德里达等,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现代性的如此话语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如:阿道尔诺、霍克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背景下的研究为,由启蒙发端并以启蒙为目标的现代性文明依其本性而辩证地转化为了“启蒙”的反面:神话、迷信和野蛮。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②Blaise Pascal,“The Memorial,” in *Pensées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Honor Lev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8.

③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齐冲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1页。

④George Price, *The Narrow Pass, A Study of Kierkegaard's Concept of Man*, ed. D. H. J. Warn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10—13.

⑤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上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9页。

⑥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04—107页。

⑦Gabriella Farina,“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Dialogues in Philosophy, Mental and Neuro Sciences* 7, no. 2 (2014): 50—62. <http://www.crossingdialogues.com/Ms-A14-07.pdf>.

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哲学》,杨韶刚等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8—30页。

—1984)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都表明,这种个体与文明的紧张常是以个人的牺牲为代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的疯癫、人的畸形变态更成了社会常态^①。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都对人性的如此境况作了重点关注,形象地表现出了人如何遭受着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本质上所形成的对抗之势的困境,怎样地被畸形、梦魇、分裂和变态所困^②。现代主义大师詹姆斯·乔伊斯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的笔触指向了人类黑暗意识的深处,从本体论意义上呈现出人的本质问题。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从题目本身就暗示他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人心的阴暗。故事的核心虽然呈现的是“文明”的欧洲人到了非洲后,在非洲丛林原始野性的蛊惑下,心底深处的原始野性复苏而有意识、无意识地从事着邪恶之举,但小说的开篇、中间及结尾对欧洲其他城市如伦敦的涉及则曲折迂回地指出,非洲的那种原始野性是人类世界的共性。后现代主义突出的特征就是对启蒙人性观宣扬的这种自律主体的怀疑,即对启蒙的解放大叙事的怀疑。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解构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思辨理性的大叙事”“科学知识的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大叙事”,但利奥塔指出这些大叙事实际上是反人性的^③。后现代主义描写的“主体”因此更是陷入癫狂的精神状态之中。威廉·戈尔丁的大部分作品似乎都在表现人性恶的强大,在非理性面前人类文明无能为力^④。

二 对启蒙理性话语质疑性的呈现

阅读霍桑作品,我们可见他对充满启蒙话语意蕴的人和事的质疑、讽刺与批判,张扬着理性话语的对立面——如上所述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观。在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红字》的序言《海关》中,他就曲折迂回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启蒙理性、启蒙认识观的质疑与批判。霍桑谈到海关工作对他创作的影响时痛苦地说,“我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作品)的”,原因在于,“在考察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人之后,……终于得出了目前谈论的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十分有利的种种结论。……当他依靠在共和国巨大胳膊上的时候,自身力量就离开了他”^⑤。他向朗费罗诉苦道:“我试图再拿起我的笔。……当任何时候我独自而坐、独自漫步时,我发现我像过去那样在梦想着故事,可早晨在海关的时间毁灭了前些天下午及晚上我的构思。”^⑥另外,他对那些超验主义思想家们的描述也形象地表现出了他对理性对人的误导的揭示:“过去从未有过任何可怜的小村子像这样集聚着这么一群穿着奇异、行为古怪的怪异之人。他们自认为是掌控世界之命运之重要人物,却只是些令人生厌之人。”^⑦

在霍桑的审美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形象的人在启蒙理性观照下认识不到自我、丢失自我的呈现。《红字》中的海斯特,《福谷传奇》中的奇诺比娅,《古宅传奇》中那些务实的、以祛魅的双眼看世界的人,《通天铁路》中那众多市民,还有那些如《拉帕奇尼的女儿》中的拉帕奇尼等的魔鬼般的科学家,他们都在时代的感召下对自我的理性认识能力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够以自己的理性认知世界、掌控自己的命运,却未能为自己、为家人开辟出新的天地,最终导致的是迷茫与误入生活歧途。如此审视启蒙理性,如前所述,有论者认为是霍桑的保守所致。如著名的美国社会批评家、政治理论家及文学批评家鲁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20世纪中叶发表的著述中指出,“霍桑是那新英格兰转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思想家……没有多少其他美国人像他那样地扎根于传统,怀疑变迁而根深蒂固地保守”^⑧。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评论界都还有相当强烈的声音批评霍桑的保守。雷诺兹(Larry J. Reynolds)在20世纪末指出,对于博科维奇及其他一些批评家来说,霍桑的“中心问题是保守主义的(axis of conservatism)”^⑨。弥尔顿·斯泰恩(Milton R. Stern, 1928—2011)也认为,霍桑是“一

①参见: D. Taylor ed., *Michel Foucault: Key Concepts* (Durham NC: Acumen Publishing Ltd., 2011), 143—157.

②参见: 卢卡契《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李广成译,选自袁可嘉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③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37—47.

④Reiderick R. Karl, “The Metaphysical Novels of William Golding,”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I, ed. Carolyn Riley (Detroit: Gale, 1982), 119.

⑤纳桑尼尔·霍桑《红字·福谷传奇》,侍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0—31页。

⑥Quoted in: Edwin Haviland Miller, *Salem Is My Dwelling Place: A Life of Nathaniel Hawthorn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1), 265.

⑦N. Hawthorne, *Delphi Complet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Delphi Classic, 2016), 2169, <http://www.delphiclassics.com>.

⑧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2001), 250—251.

⑨Larry J. Reynolds, *A Historical Guide to Nathaniel Hawthor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9.

个古典主义式的保守主义者”^①。

但我们认为,若用马克思开启的现代性批判主流话语对启蒙话语的质疑来观照,霍桑在其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设计等揭示出的是作家在从认知途径上对现代性语境下宣扬的我思主体的不信任,甚至解构,在隐喻地表现着当时激励人心的启蒙话语的虚妄而把人置入新的困境。因为在霍桑及现代性批判主流话语视野中,这种以认知主体自居的认识观,把自我作为主体,其他一切都变成了客体,自我与周围世界的一切变成了主控和受控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②。如此,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人遭受到的是被理性的分裂。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③。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④。

而在霍桑的审美呈现中,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物化了,人以处理物的方式在理解人、处理人,所以,在其短篇小说《胎记》开篇之处就形象地表现出了理性精神对生活极其深入的渗透:纯粹的科学精神已延伸、变异成了生活中普遍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引导着人的生活,改变着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那年头,电及其它大自然的奥秘刚被发现,仿佛打开了进入奇异世界的条条途径。人们热爱科学,那份深情与专注甚至胜过对女人的爱。超群的智力,想象力,精神,甚至感情,都能从各种科学探索中找到相宜的养料”^⑤。但人的精神、情感,灵魂深处的问题也以科学技术的方法处理,用掌控与受控的关系来处理,其结果导致了乔治亚娜之死的悲剧。

《拉帕齐尼的女儿》中的拉帕齐尼在科学精神鼓噪下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强大就等同于幸福,只看到了人的物性,而完全忘却了人形而上的需求。因为充满毒气可以战胜对手而显得强大,他把女儿培养成了充满毒气的生命,希望她能够因为拥有这种带毒的武器而变成强大无敌的人,从而使她获得幸福,完全认识不到由此造成的父女俩与自我、他人、自然、世界相隔离的孤独生活不是人渴望的生活,不是所谓的幸福。《通天铁路》中的众市民在战天斗地的理性准则的鼓噪下,建造出了快捷、方便的巨大人工空间,以及空间中那些看似显赫宏伟的工程,但承受的是噪音、毒气、严重的生态污染,以及名利城中那种为了自己眼前的所谓物的利益而相互间尔虞我诈,完全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爱与同情,失去了对人生存意义的任何考量。这些隐喻性地表现,人在祛魅后的世界中,在所谓理性的引导下,只认识到人的物质需求的一面,丢失的是人的基本情感需求、精神需求,并极其愚昧地破坏着自己的家园,破坏着自己基本的生存环境,登上的并非是世代以来人渴望的、努力探寻着的通天铁路,而是毁灭之路。

《古宅传奇》中平齐安一家从第一代平齐安上校开始就有务实的、不怕鬼魂的理性精神。在数代人历经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对幸福的认知就是财富的多寡。因此,为了财富,他们甚至可以掠夺他人性命。如此以我思为基点、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私欲为目标,导致的是争夺财富的血腥和人与人情感联系的丢失,甚至家人亲情的消亡。这显然也不是人渴望的幸福,而是悲剧。这样戏剧性的呈现表现了人因对世界与对自己的错误判断而误入的陷阱。小说叙述平齐安家族“具有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一般特征”,而且到现代性更盛的共和国时期,“社会生活在波涛中起伏,是经常有人处于被淹死的危险之中”^⑥。所以,平齐安家族的命运变成了人类普遍的命运。

总结这种种的表现,我们认为霍桑审美地、深刻地呈现了对启蒙认识观的质疑,对爱默生的具有时代指标性的话语的驳斥:“相信你自己的思想”导致的并非是对自我、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而“获得全世界的认同”,而是随着这种理性话语的深入,人越加不能对自我作出正确的把握,并把一切关系都理性化、物性化了,也即人被严

① Milton R. Stern, *Contexts for Hawthorne: "The Marble Faun" and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 and Clos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1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③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④ 亨利·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⑤ 纳桑尼尔·霍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姚乃强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1页。

⑥ 引文参见:纳桑尼尔·霍桑《古宅传奇》,韦德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7页。

重地物化、异化，而陷入了深重的人生困境。

三 非理性因素：通往人生真谛之真正途径

另一方面，在霍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上述理性化形成鲜明对比的形象。它们隐喻性地表现着本能、直觉等非理性因素使人如何得到了真实的认识，强化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是非理性因素，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时代强音高扬着的对人的自因、自明、自足的理性主体的信念的不同阐释。

短篇小说《雪人》艺术地突出了男主人林赛先生在时代理性精神倡导下导致的务实精神乃至只注重看得见的事实和科学精神而弃绝想象的精神世界的行为，与他女儿孩童的童真及他妻子女性的直觉形成鲜明对比，以及这两种精神对生活的深刻影响的对比。在前者的生活世界中，一切与想象的、蕴含精神深度的、带有丰富情感色彩的生活样态都消失了，他能触及到的是常理、数字，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实体。所以，他孩子的孩童想象创造奇迹的能力他是看不到的，只能被他扼杀。小说结语总结说：“对于林赛先生这类聪明的好心人来说，……他们了解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即算大自然或他们身边的某些现象超越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哪怕这现象就在他们鼻尖下头，他们也认不出来。”^①

《伊桑·布兰德》中的伊桑·布兰德，在被智性化之前非常淳朴。淳朴是使他与人生真实相通之路径，使他能享受到人生的宁静，能与同胞、大山、自己的血肉相连，也使他能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这深深地刻在了他意识深处的记忆之中，总是令他痛苦地闪现着当时“夜露如何悄悄落在他身上——幽黑的林子如何对他低声细语——星光如何在他头顶闪着微光”^②。表现出本能、直觉、想象等感性素质才是认识的主导因素。故事结尾极具艺术性地对那小山村片刻的宁静优美描述更突出地强化了这一点：此时，当理性化的伊桑·布兰德死了，永远地离开了，那被群山环抱的小村呈现出了未经理性浸染过的，充满感性的、自然的、和谐的美景：“朝阳已将金色的光芒洒遍山顶，山谷仍在阴影之中！却愉快地微笑，预示灿烂的一天正急急到来。村庄完全被群山环绕，群山渐渐隆起远去，村庄仿佛宁静地安歇在上帝巨大的掌心之上。”^③

另外，作者还以这样的视角表现出了非理性因素是引人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途径：许多因无法把握人生真谛而陷入痛苦、孤独飘零、绝望境地的人物又在痛苦、孤独飘零、绝望等境地中悟出了人生真谛。这些人物如伊桑·布兰德、埃里斯顿、阿瑟·丁姆斯戴尔、胡珀牧师、海斯特·白兰、奇灵沃斯等。这样的呈现寓意深刻。痛苦、孤独、绝望触动的是人的本能、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属于人的情感部分。因此，这是以隐喻的方式在讲述，人的非理性因素如何在朦胧之中、在人的无意识之中，助人了解到了一些生命本相。如当伊桑·布兰德的理性化使他陷入与他人、社会、自然、自我的全面分裂的痛苦之时，极度的悲痛又使他体会到了他的悲剧来自他智者的胜利。智性化阻断了他与自然、人生的天然连接。他认识到了情感的重要，认识到了与自然、大地、星空亲切触摸的重要，认识到了与同胞血肉相连的温暖。他认识到，“以圣洁的同情心这把钥匙，来打开我们共同本性的牢笼，这样做给了他分享其中全部秘密的权利”，而现在“他不再是人类的兄弟”^④，原因是他丢失了这把金贵的钥匙。

再如《红字》中的亚瑟·丁姆斯戴尔，在他与海斯特·白兰的通奸暴露后，作为牧师，他感到他自己罪孽深重，但他又因那么爱他作为那地区广泛受人尊敬的牧师的荣誉而不敢暴露他的奸情，从而使沉重的罪孽感在他心上深深地压着，使他深感罪加一等。他鄙视自己，认为自己是罪人，不敢与他人交往，生活变得痛苦之极、孤独之极、绝望之极。但也正是这种极度痛苦，“才使他对于人类犯罪的同胞能有那么亲切的理解”^⑤——他更能领悟到一些人生本相了。

综上所述，在启蒙人性观强烈地激励着他的时代之时，霍桑却表现出了与时代不同的观点，深入探讨了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揭示出了那隐藏在人的意识表层下的巨大力量，呈现出了他对人的认识能力和途径的洞察，对人性中无意识力量的认知能量的深悟。在此，那原始的冲动、基本的生命本能比理性、文明和科学强大，能支配人的行为、影响人的命运，能使人领悟到一些生命的本相。这种描写表现出了霍桑与他所

① 纳桑尼尔·霍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第1265页。

② 纳桑尼尔·霍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第1224页。

③ 纳桑尼尔·霍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第1227页。

④ 纳桑尼尔·霍桑《霍桑集：故事与小品》，第1225页。

⑤ 纳桑尼尔·霍桑《红字·福谷传奇》，第98页。

生活的时代那种人的自律、自足、自明的主体理性完全不同的观点,表现出了对当时社会对人认知途径观点的解构。另一方面,霍桑对人作出的如此洞悉,充分表现出了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现代文化对人性认识的相似;表现出了他对人、对人性洞察的深刻与前瞻性,以及对人如何才能寻得真正自我的深思,如何才能建构起真正关注人自身建构的人文主义的深思。

由此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霍桑在他逝世后的漫长的一个半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美国文学经典作家地位的深刻原由。霍桑专家布兰德·文丽坡(Brenda Wineapple)在其21世纪初的著述中指出,“尽管其他已逝的白人男性作家的声誉已降,……霍桑还有力地保持着”他在美国文学中的中心地位^①。另一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丽塔·科·戈林(Rita K. Gollin)则认为,霍桑的作品尽管写的是他之前的时代、他的时代,但“也写了我们的时代”^②。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加拿大学者琳达·哈庆(Linda Hutcheon)指出,“事实上,霍桑的小说就是人们熟悉的后现代主义文本”^③。

On Nathaniel Hawthorne's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odern Self-Discipline Subject

MENG Xue-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along with the humanity view established by René Descartes' "I think", believes that man is the cognitive subject of self-cause, self-clarity, and self-discipline. Such confidence in people inspired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ll emerged in this context. However, Nathaniel Hawthorne,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 has a different view from the human nature view promoted by thi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showing similarity to the western modern cultural irrational human nature view. He believes that man's dominant power is the unconscious power deep in his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conscious factor of ma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for him to understand himself and the world. Hawthorne was able to treat human nature in the way of a modern thinker at the time when inspiring new culture was in such a strong momentum, which demonstrate his profound and forward-looking insight into people and their survival situation, and his search for humanism that truly cares about true human nature.

Key words: Nathaniel Hawthorne; view of modern human nature; subject of self-discipline; irrationalism; epistemology

[责任编辑:唐 普]

^①Brenda Wineapple, *Nathaniel Hawthorne: A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181.

^②Rita K. Gollin, "Nathaniel Hawthorne," in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1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2116.

^③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132.